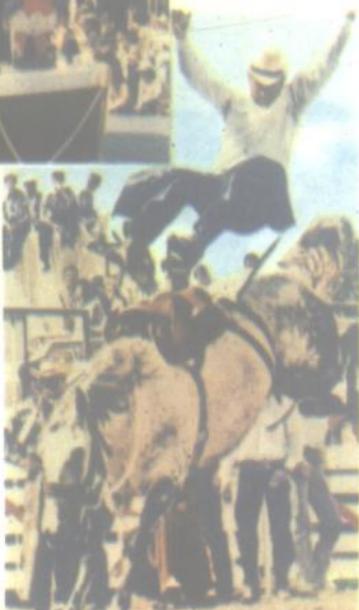


美 国 见 闻

(苏) 根纳季·瓦西里耶夫著



新 华 出 版 社

美 国 见 闻

(苏)根纳季·瓦西里耶夫著

王子英等译 陈新华校

新华出版社

Геннадий Васильев

АМЕРИКА
МЕНЯЮЩАЯСЯ
И НЕИЗМЕННАЯ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4

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84年版翻译

G212.2
WXL

美 国 见 阅

〔苏〕根纳季·瓦西里耶夫 著

王 子 英 等译

陈 新 华 校

新华出版社 出 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 刷

452496-50
344页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插页2张 215,000字

1988年12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 —— 1,450册

ISBN 7-5011-0250-8/G·69 定价：3.55元

译者的话

1986.6
这本书是苏联新闻记者根纳季·瓦西里耶夫的采访札记，由22篇彼此独立而互有联系的通讯和特写组成。它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八十年代初期美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和各行各业的情况；介绍了有关美国的历史、地理和习俗，并着重揭露了这个资本主义大国的种种社会矛盾现象。

作者根纳季·瓦西里耶夫是苏联的著名驻外记者。他的记者生涯始于朝鲜战争后期的平壤。后来他相继担任塔斯社驻纽约记者、《真理报》驻伦敦记者、《真理报》驻华盛顿记者，先后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将近10年。他的一系列通讯和特写集已陆续出版，本书就是其中之一。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王子英、马云亮、杨成明、李成、姚炳虞、贾志平、程受珩。

作者的话

1960年5月，我取道莫斯科——哥本哈根——纽约航线飞往美国。那时万没想到，在美国当记者会“夺去”我一生中这么一大段时光。美国竟成为我多年来职业“开发”的主要对象和使人类日益感兴趣的主要目标。我在哈得逊河畔的城市①度过五年。后经十年中断，又在华盛顿工作了四年。我曾多次到海外作短期出差。我的记忆和笔记犹如计算机的磁带，上面积累了大量材料。其中有我熟悉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亲身经历的各种事件，还有这个国家、她的城市和大自然给我的观感。正是这些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了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形象。

有意思的是每一次来到美国，总会发现一些与上次来时不同的地方。不只是服饰、熟悉的街道、广场有变化，而且反映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深刻演变的社会情绪也显得不一样，这种演变是复杂的，常常是剧烈的。于是我便产生了一个念头：仔细品味我所见到的东西，把那些有典型意义、相

① 指纽约。——译者

对稳定、为美国所固有的、代表美国人和所谓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东西叙述出来，同时指出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这本书讲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美国，它的城市和人民。由于多种原因人们对这个大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曾经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占据统治地位，目前却处在相对削弱时期。它的内部矛盾有增无减。它正在寻求适应世界上变化了的情况的各种办法。

本书并不奢望全面、系统地阐述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历史。通过这些相互关联的叙事特写，作者打算生动地讲述当代美国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谈谈我所看到的美国。

目 录

作者的话

途中的美国	(1)
最早结识的一个美国人	(13)
从110层楼上俯瞰	(31)
在交易所	(56)
华尔街之雾	(71)
哈莱姆的两天	(88)
为了改造世界	(101)
石头和人	(118)
汽车大王的城市	(137)
底特律为何停步不前?	(162)
约翰就是伊万	(174)
华盛顿一日	(186)
在亚利桑那的印第安人那里	(212)
奥采奥拉的后代	(235)
白宫墙外的印第安人小房	(251)
无与伦比的得克萨斯	(265)

当心：三K党！	(283)
在武器交易市场上	(299)
玉米和炸弹	(306)
洛杉矶的光明面和阴暗面	(316)
会见托马斯·杰弗逊	(325)
公路通向地平线	(335)

途 中 的 美 国

发动机几乎是无声地转动着，风从汽车两侧吹来，呼呼作响。柏油路接连迎面飞来。右边，一辆红色的“福特”汽车与我们并行；左边，一辆破旧的“丰田”牌橙黄色带篷运货车紧跟在我们这辆带拖车的“科尔多瓦”车后面，而在货车后面，则是一辆黑色的“林肯大陆”牌大型汽车。这种许多汽车并驰的情景，令人迷惑。我们好象被许多根无形的线联结了起来，我们似乎在原地不动。无论是奔驰在前面的、漆得发亮的数十辆汽车，还是映照在反光镜里的、五颜六色小甲虫似的大批车辆，也都似乎停在原地不动。我们大家都一动不动，而被千百个猛烈旋转的车轮磨擦着的柏油路面却急速地迎面飞来。同柏油路一起迎面而来的还有公路两旁不时出现的、漆着各种鲜艳色彩的加油-小吃综合商店、工厂厂房和实验室建筑，以及从头上飞驰而过的水泥桥拱。

我看速度表，表针指向“60”。我们大家的车速都是每小时60英里，比目前美国公路限制的速度快5英里。这是可以的，交通警察对这种超速行驶放任不究。超过更多就要处

罚。60英里以上每超过1英里罚款1美元。

在汽车挡风玻璃上方的镜子里，我看到一个深红色的点。这个红点越来越大，变成了一辆急速行驶的赛车。在最左边一排，有个纨绔子弟驾着一辆凸鼻子“费拉里”牌汽车正在赶超我们的车。12个汽缸的发动机，发出飞机般的哒哒声，这辆“费拉里”飞快的行速超过了所有的车辆，消失在转弯的前方。不过5分钟工夫，一辆闪烁着红蓝灯光的警车尖声呼啸着疾驰而过。它从埋伏的地点突然出现，正在追查违犯行车规定的司机。直升飞机发出哒哒的响声，它正在指挥地面交通警的行动。

汽车在奔驰。五条行车线朝着一个方向，五条行车线朝着另一个方向。成千上万个车轮在转动，把带子般的道路抛向后面。

一些美国人两手紧握着方向盘，两眼盯着迎面奔来的空间，急急忙忙地开着车。这些美国人中，有的是穿着白汗衫（熨平的深灰色上衣挂在侧窗旁边的挂钩上），衣着整齐、白发苍苍的医生和律师；有的是穿着五彩缤纷的背心，留有长发的年青人（老练的汽车司机都提防这种人，尽量同他们保持距离）；有的是正正派派的，然而却愁眉不展的“蓝领”工人。有的单独驾车，有的携全家人驾驶着旅行车（一种有“万能”车身的汽车），行李间装满箱子、手提包，小孩的鼻子贴在车窗玻璃上。

他们急急忙忙去哪里？他们在想些什么？什么事使他们不安、担心？他们梦想些什么？希望什么？

有名的政治理论家西奥多·怀特①说：“美国人进入80年代以后，感到自己是上山的火车里的乘客，是背对运行方向坐着的乘客。他们看到的是落在后面的一切——越南、水门事件、被揭露出来的中央情报局丑闻，但是谁也不知道山口后面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

华盛顿一名鹰派记者罗兰·埃文斯向我证明说：“美国人不习惯向后看。这是跟他们的民族性格相对立的。越南、水门事件……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过去，都被遗忘了。象汽车司机一样，美国人只向前看，看公路。可是我们的道路急剧地向右转。”

背对运行方向坐车——这种位置虽然也有助于思考、认识已经过去的事物，但却不是最合适的位置。不知道什么东西留在后面，不知道两旁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也不是很可取的事。有经验的司机很懂得这一点——他注意向前看，但有时候也得看看反光镜和旁镜。

在20世纪倒数第二个10年中，在美国建国207年②的时候，美国究竟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并非那么容易。美国在变化，它开始对自己有另一种看法。

20年以前，厄斯金·考德威尔③去美国各地旅行时写

① (1915—) 美国记者、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因写有关于总统选举的著作《总统的产生——1960》和《总统的产生——1964》而闻名。——译者

② 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于1776年7月4日。——译者。

③ 美国著名作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写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对美国南部农村的贫穷白人佃农有一定的影响。代表作有《烟草之路》、《小墓地》等。——译者

道：“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利坚合众国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到处都在变化。到处都是苟且偷生，通宵营业，季度开始前停止营业，对任何人都表示欢迎，仅供白人，有色人入口，过多的财富和绝望的赤贫，侵略和反动，笃信宗教的虔诚和肆无忌惮的放荡行为，今天购买，明天付钱，分期付款，记帐，不劳而获，工作一天领一天报酬，蓄意敌视的纲领和忠实友谊的计划。

“应当怎样理解所有这一切？从何着手？

“不用说，走一走，看一看。”

在这一幅美国素描中，某些东西已经过时。现在未必能在某个地方，甚至在最南部找到“仅供白人”或“有色人入口”这样的牌子。但是在其它方面，这些草草勾画出的速写反映了令人吃惊的当代现实。一系列锋利明快的、匆忙剪辑的电影镜头塑造成你今天看到的美国的形象——这个国家有鲜明的对比，充满矛盾。既富有生命力，却又软弱无力；既是富有的，却又对穷人漠不关心；人们的生性善良，社会组织却又残酷无情。

当然，象20年前一样，作者的劝告是正确的：为了理解这一切，必须走一走，看一看。

上坡时，汽车发动机低声叫着。风沙沙地响着，极力阻挡加大马力奔跑着的汽车。从反光镜里我看到了挂在后头的旅行拖车突出的前部。看来，拖拉有轮子的铝制房屋在公路上行驶不是那么困难的，技术稍微熟练一点就行，刹车不能

太急，从一条行车线转到另一条行车线时，拐的弯要大一点。只要能做到这些，一切都会跟平时一样，就好象后面没有一条笨重的“尾巴”一样。

样子象雪茄烟似的旅行拖车在公路上闪着亮光。15只“陆上快艇”，象一群骑马游人，排成一溜在公路上奔驰，每只都由一辆克莱斯勒科尔多瓦牌汽车牵引。加油塔上的工人们斜眼看着说：“各种人都来了！除了富人，谁能买得起这种旅行汽车？”

但是，我们是没有过错的。我们是昂贵的旅行拖车（第一批移民乘坐的带篷马车的等价物）的临时拥有者。我们是驻华盛顿和约纽的外国记者。我们很荣幸地成为美国当局组织的汽车旅行的参加者。旅行路线是由美国对外联络局拟定的。为了吹嘘旅行拖车和流动生活的好处，威利·拜厄姆基金会公司给我们提供流动房屋和直接从装配线上下来的新汽车。发给每个人的旅行计划里说，这次旅行的目的是：“让别人看看美国，让别人了解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白天，我们在极好的公路上行驶200至250英里。晚上，我们停在每平方米都有供水供电和排水设备的专用停车场上。黄昏时分，落日的橙黄色的光线从松树顶上照射下来，我们吸着针叶树枝的馨香和篝火的带苦味的轻烟，倾听着地方志专家讲述本州的风景和历史。

我们的保护人在执行一项社会任务，用这里人的话来说，给参观者看看“生活的光明面”。即使是这样也要说声

谢谢啦。任何一次旅行都有助于认识这个国家、了解并弄清一些事情。不管美国的公路是多么合乎标准的模范公路，道路两旁的土地都随着向南延伸而不断变化。开头是荫凉的繁花盛开的石楂子树，接着是泛着暗光的沙坡上的青铜色的松树林。而在佛罗里达州，炎热的蔚蓝色天空下小橙树林延绵不断。尽管这次宣传性旅行的组织者所准备的会见都是有选择的，我们所见到的总是活生生的人，有时是非凡的人。譬如萨凡纳停车场那个看守人，原来是一位从接受军事定货的实验室里逃出来的获奖的物理学家。不管旅行是如何组织，也不能把生活限制在广告式的范围之内，也不能把它变成美国机场旋转装置上和戈瓦德·琼森公司的路边咖啡馆里所展览的光亮的美术明信片一类的东西。

当局不让去的地方，我们就按《真理报》记者的路线前往。如果太远，我们就乘飞机去。但愿这次乘坐旅行车的游览成为在美国进行长途旅行的开端。

气流呼呼作响，仿佛对迎面冲来的金属和玻璃感到愤怒。路标、桥梁、加油站扑面而来。下坡的标志一闪而过。旅行开始了。

我们将要抵达哈得逊河岸上的一个城市。对外界来说，这个城市早已成为大洋彼岸的国家的象征，虽然它的许多居民会说，纽约还不是美国。

我们将访问正处在艰难时期的汽车城底特律。

我们的汽车轮子将要碾过出产小麦和玉米的中西部的公路。

我们将去参观印第安人的特居地。在特居地里，生活的外部表现跟野人时期几乎一样原始。

我们将在华盛顿的“权力走廊”及其附近地区逗留。

在加里福尼亚，我们将受到日益高涨的防止核战争运动的参加者的殷勤接待。

我们将在空间和时间里移动，把今天的美国同10年、20年、200年以前的美国相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回答（那怕是接近于回答）这些主要问题：为什么美国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往何处去？试图进入这条广阔的、旋涡团团、逆流重重的“空间与时间”的河流，这是多么自信，多么不谨慎呵！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别的合适的途径。今天谁还需要20年前有销路的诸如《美国十日》、《从火车窗口看美国》、《摩天大楼的阴影下》等这样象微风一样轻飘的游记呢？

……过了查尔斯顿，公路进入山中。道路变得象秋千一样，一会儿使汽车上升，升到山口，一会儿又使它下降，又上升，升到雷雨交加云雾滚滚的天空，接着又下降，下降到凉爽的蔚蓝色的山谷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前地带开始了。北美洲大陆东部的主要山脉，沿着道路左边的绿色山岭缓缓上升。当汽车再次跑上山口时，在右边展开了一个广阔的平原——万水之父密西西比河的弟弟俄亥俄河谷。

汽车的散热器吞食着英里。阿巴拉契亚山脉的秋千摇摆着：上升下降，又升又降，高潮低潮，高潮低潮，好象这条“空间与时间”的河流中的落差。

在近四分之一世纪中，社会气候的落差现象，国家政治生活的高潮和低潮，时有发生。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人民生活之河泛滥成灾，汹涌的河水冲坏了河岸，好象能够改变河道。然而，退潮了，河水渐渐消失了，好象渗进沙子流走了，河水渐浅，露出了底。

社会积极性的高涨产生希望，社会积极性的低落散布失望。我理解辛克莱·刘易斯^①为国担忧的心情，他说：“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经常变化，从乐观到悲观，又从悲观到乐观。而且，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每个报道或谈论美国的人身上，国家是这个当代世界最自相矛盾的、最不可思议的、最令人不安的国家。”

我是在1960年5月初次见到美国的。当时，我怀着激动和极好奇的心情期待着与这个国家见面。当我乘坐的汽车从航空港跑上陡峭的三镇桥上时，一排紫色的纽约摩天大楼映入眼帘，这时这个国家显得雄伟、阴森。杂乱的最初印象、千变万化的事件和迅速接触到的一切，这些使我觉得，这片国土和人民的外貌是那样五光十色。

这时美国处在麦卡锡主义之后的解冻时期。人们说话已不用提心吊胆。业余的弹唱者弹着班卓^②和吉他走上街头，编出勇敢的、讽刺“生活主人”和制度本身的叙事歌。反对军

① (1885—1951)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美国小说家，当过记者和出版社编辑，其代表作有《大街》、《巴比特》、《阿罗斯密斯》、《多兹沃思》。
——译者

② 广泛用于美国民间音乐和爵士乐的一种琴，标准班卓琴有五根弦，用拨子弹奏。
——译者

国主义，种族主义游行示威的参加者，引用歌唱家和诗人鲍勃·迪兰的诗歌唱道：“时代变了”。国家被戏剧性的事件——“黑人革命”和“青年暴动”搅扰得不安宁。人们注视着（有的人同情和期望，有的人敌视）蒙哥马利、伯明翰、杰克逊等地黑人的示威，注视着哥伦比亚、加利福尼亚、威斯康星等大学学生的骚乱。

接着，反对肮脏的越南战争的群众性浪潮，激发并吸收了所有这些潮流。浪潮是强大的，它冲走了没有远见的政治船长，迫使改变美国这艘轮船的航向。

15年以后，我又来到大洋的另一边。我看到，美国有点象一个翻船后被抛到岸上的游泳者。一个人精疲力尽地躺在沙滩上，惊奇地环顾四周，力图弄清所发生的事件。美国历史上的首次军事失败、玷污总统名誉的“水门丑闻”、揭露出来的情报机构的不法行为——所有这一切引起了惊慌失措，引起了对政权机构法规的不信任和人们的深思。

1975年5月，一些报纸还刊登了从西贡市（现称胡志明市）逃跑的美国人及其当地奴仆的图片。记得在《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这样一张图片：美国使馆屋顶塔楼上空有一架直升飞机，从飞机上象一嘟噜葡萄一样垂挂下来一些人，最后几个“果实”脱落了，就要坠落。不久，美国人在电视荧光屏上看到了寿命不长的、狂妄无比的“拦路强盗”——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前任头头。这些人到处奔波，想方设法为自己洗刷，先是装出忏悔的样子，后来又露出傲慢的面目，结果被召到参议院委员会里去，嘟嘟囔囔地说，他